20 年来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路径及突破空间

郑桂华

摘要　20 世纪末以来，国内语文教材的文化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课程论的角度探讨语文教材文化的整体建构，二是借鉴西方文化研究范式考察教材文化的价值取向。不过，两条研究路径的出发点、文化价值观相互冲突，且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语文教材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依据“新文化观”对中国语文教材的文化价值进行重估。

关键词　语文教材；　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郑桂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海 200234）

语文学习的任务不单是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还承担着青少年的文化养成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很大程度上需要以语文教材①为媒介、通过阅读教学等活动来实现。

我国的语文教育历来重视文化内涵。从古代语文教育对传道的重视，到五四前后国文学习对启蒙功能的看重；从建国以后语文课对政治取向的突出，到今天语文学科对育人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强调，都可以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传统。但问题是，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既不同于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那样是由确定的知识构成的，也难以像语文学科中的字、词、句、篇等知识那样可以得到比较明确地呈现，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价值判断标准也是相对的。其原因不外这样几点：从文选类教材的本体看，教材中的每一篇“选文”都是蕴含着各类信息或教育价值的集合体。文中的语文知识与文化信息，显性意味与深层意味，核心思想（主旨）与无意表露的情绪趣味、当时的写作意图与今天可解读的意义等，往往相互交错、难分正误。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其文化内涵更不像议论文、说明文那样常彰显于标题和关键的字句中，而很可能隐藏于纷繁的语言表象或独特的结构背后，因此，面对一篇具体的阅读材料，不同的读者在价值认识与轻重取舍上很难形成共识。第二，对教材中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时常受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主流价值观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一段时期内被肯定的某种文化取向，到另一个时期则可能变就会被否定或无视。以鲁迅的《风筝》为例，原作是借哥哥（“我”）毁坏弟弟心爱的风筝的故事，反思中国旧教育观对儿

① 关于教材的词汇，有语文教材、语文课本、语文教科书等三种概念，是相对于不同的对象而言的，内涵差异较小，本文通称语文教材。

童的“精神虐杀”以及受害者自身的精神麻木,这与作者“铁屋子”的比喻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出发点一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味。不过,后来人们不断另辟蹊径,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自我批判意味”、“反抗绝望精神”、“儿童教育的理念”、“兄弟亲情”甚至“爱情观的隐喻”。[1]当然,如果从民俗的角度,还可以去感受文章介绍的风筝文化,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文本话语背后隐含某些权力、阶层、性别偏向,或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考察文字下面作者的内心世界。

一个文本蕴含着如此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给多元解读提供了许多可能的空间,这不仅给语文教材的编撰者带来方便,也利于教师对文本作个性化的解读和设计教学目的。例如,当前国内四套收有《风筝》的语文教材,就通过其单元组合意图、课文阅读提示以及文后的思考练习题,对《风筝》一文的文化教育价值分别作了提示:

教材版本	故事的定位	教育价值取向
2008 年河北师大版(六下)	一个童年故事	多彩童年,成长中的酸甜苦辣,
2009 年人教社版(七上)	一个家庭故事	兄弟亲情,感受严与爱、自责与谅解
2013 年语文社版(七上)	一个儿童教育案例	尊重教育规律,认识游戏的价值,儿童的天性
2011 年上教社版(九上)	一个教育观及社会文化隐喻	反对专制教育,呼唤自由解放

《风筝》在不同教材中文化价值定位迥然有别,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一篇文章经过教材编撰者的处理,某些文化信息可能被选择而另一些信息可能被遮蔽,一些信息被强化,而另一些信息则可能被弱化。那么,哪些文化价值应该被选择和强化、也即最值得向学习者传递呢?同时,哪些含有负面价值的文化信息可能隐藏在某些课文中,将会通过语文学习活动对学习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这是语文教材文化研究两个基本问题。

一、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小学教材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及文化批评学派的研究视野向教育和课程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的迈克·F·D·扬,美国的 W·M·阿普尔和詹姆斯·A·班克斯等人。迈克·F·D·扬在 1971 年出版的《知识与控制》一书中,沿着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布迪厄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批判思路,提出了教育课程中的知识受社会组织控制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换句话说,所有的课程都反映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2]阿普尔思考的重点是意识形态对课程与教材的影响,他指出,“课程的政治并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它还涉及谁来选择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被